

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的知识生产误区与消解

康益豪¹,吕万刚²,王相飞¹

(1.武汉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武汉体育学院 党政办公室,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案例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中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方法,在体育学研究中日趋流行的同时,衍生出一些知识生产的误区。依据理论负载程度由低至高,上述误区依次表现为“现象描述”“循环论证”和“理论套用”。若想消解这些误区,需妥善处理案例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具体可通过“理论修正”“理论拓展”“理论深化”等方式,将案例研究的理论负载程度保持在合理区间。该研究弥补了体育学领域对案例研究知识生产误区缺乏讨论的缺陷,能为后续的体育学案例研究提供指导与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体育学研究;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理论负载;理论修正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6)04-0048-11

DOI：10.15877/j.cnki.nsic.20260403.001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体育学研究的日益丰富与多元,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逐渐崭露头角^[1]。在质性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的案例研究(一种以小样本、深描式与理论生成为导向,对特定情境中单个或多个典型事件的发生背景、过程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归纳出具有解释和预测作用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2],凭借其“特定体育情境中单个或多个典型事件”的系统分析能力,进入越来越多体育学者的研究视野(截至2026年1月23日,研究团队以“案例”“个案”“为例”为篇名主题词,对中国知网的体育学核心文献进行检索发现,共有1 589篇学术论文)。该研究方法已成为体育学研究中的关键方法^[3]。

就当前体育学案例研究的实践脉络而言,其一,在研究取向上,形成“内在型案例(intrinsic case)”与“工具型案例(instrumental case)”并存的图景。前者聚焦单案例或多案例的情境化深描,注重呈现特定案例的复杂过程;后者以特定的体育案例为载体,试图提炼出具有跨情境解释力的一般性知识^[4]。其二,在方法论探讨上,随着推动我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热点议题,部分研究者开始倡导体育案例研究本土化学理建构,尝试突破对西方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案例研究的化约式模仿,结合体育

学科特性探讨体育案例研究的学理基础和基本要素^[3];其三,在应用领域上,已覆盖体育学的核心领域。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马拉松赛事风险敏捷治理的构建路径和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源短板^[5-6],到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探索和体育明星榜样效应的生成^[7-8],再到争议判罚的舆论演化和体育争议性事件的研究^[9-10],体现出案例研究对体育实践的回应能力。

然而,学界关于案例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依然存在争议。一类观点认为,体育学案例研究的知识生产应聚焦于“独特性知识”的挖掘,主张通过对特定体育案例的情境性“深描”,充分剖析体育案例的复杂逻辑,这一取向在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体现^[6];另一类观点强调,案例研究需竭力追求“一般性知识”^[11],认为应通过对特定体育案例的研究深化相关理论认识,以促进体育知识生产、体育理论建构并推动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3]。这两类观点的分歧,本质上反映了案例研究

收稿日期:2025-12-1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7批面上资助项目(2025 M773179);2025年湖北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5D094)。

第一作者:康益豪,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信作者:吕万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中知识生产的复杂性,也正是这种复杂性引发的认知模糊,导致体育学案例研究涌现出不少知识生产的误区。这些争议和误区背后,指向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定位模糊与路径缺失——既未明确案例研究为何需以知识生产为核心,也未厘清当前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关键误区及成因,更缺乏消解误区的有效路径。由此,导致大量体育学案例研究停留在“经验描述”或“理论套用”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其方法论价值,制约了体育学由“新兴学科”向“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学科”转型升级的进程。基于此,凝练出以下几个前后相继的研究问题:案例研究为何要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目标?其知识生产应追求“独特性知识”还是“一般性知识”?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主要误区有哪些,其成因是什么?该如何消解这些误区,实现有效的知识生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是回应学界争议和规范体育学案例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体育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研究旨在方法学层面展开探讨,对体育学案例研究中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并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探讨^[12-13],通过反思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误区,以期后续体育学案例研究增强创新性提供参考。

2 社会科学中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义

若想深入探讨“案例研究为何要进行知识生产?其知识生产应追求‘独特性知识’还是‘一般性知识’?”等问题,需先厘清社会科学研究中“知识”“知识生产”的核心内涵,明确社会科学中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义与判断标准。这既是回应“案例研究为何要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目标”这一基础问题的关键,也是后续剖析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误区、提出消解路径的前提。

2.1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知识”与“知识生产”

何谓“知识”?柏拉图(Plato)将其定义为“得到确证的信念”^[14]。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将“知识”界定为“意识的存在方式,即客观事物以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15]。“知识”既是人类基于客观存在并通过特定载体呈现的认知与实践产物^[16],也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以各种概念体系构成人类文明进步

的阶梯^[17]。当“知识”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18],且能突破特定时空限制并对类似的实践经验具备普遍解释力时,则会成为“理论”。理论属于知识的高阶和成熟形态,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理论^[19]。理论能帮助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形成系统性认识,并对未知事实做出合乎逻辑的预判^[20]。简言之,知识是理论的基础和来源,理论是知识的抽象和升华,两者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且相辅相成。立足知识的本质属性与研究对象的差异,人类知识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3类。它们均以知识增长和理论推进为核心追求,旨在通过解释与理解世界贡献新知^[21],但在研究对象与知识的内在特征上存在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以物为主,偏于客观主义一极,追求具有普遍性、共识性与非私人性的知识;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以人为主,偏于主观主义一极,其知识往往是地方性、局部性和个体性的,侧重个体体验与文化阐释^[22];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以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其目标在于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并尽可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23],探求人类实践活动的真相与规律^[24],产出有关人类行为或现象的知识^[11]。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介于自然科学普遍性知识与人文学科个体性知识之间的中间形态^[19],兼具情境性、一般性、经验性与理论性等特征^[25]。

社会科学知识的形成与创新,需依托动态的实践探索与学术研究过程得以实现,这一过程便是“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人类基于既有知识与新的实践经验,提炼、拓展与创造知识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原创知识的生成,也涵盖对既有知识的修正、补充与整合^[26]。作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应基于新的实践经验提出实践问题及其蕴含的理论问题,并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双向循环^[17]。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以突破特定实践经验的时空限制,并借此衍射到具有同类特征的现象^[4]。这种知识生产的起点,是学界既有关于特定实践经验或现象的理论认识存在缺陷,并基于该缺陷在对应现象的知识脉络中,形成更具解释力与指导性的理论认识,进而彰显理论增量价值^[27]。这也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知识生产”,应体现出经验扎根性、理论

对话性和学术贡献性等特征:①经验扎根性源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经验性特征,社会科学的知识无法脱离现实经验凭空建构,其知识生产必须以社会真实存在的经验现象与实践难题为基础^[24];②理论对话性和学术贡献性源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一般性和理论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肩负着“创造新知”的使命,其知识生产应形成区别于现有研究的理论边际贡献并实现增量创新^[17]。此外,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常会面临理论与实践出现内在张力这一关键问题^[28],具体包括理论抽象化与实践情境性的错位(抽象化的理论难以有效指导实践和碎片化的实践缺乏理论升华)^[29]、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悖离(西方理论的本土适配性不强和本土经验停留在经验描述)^[30]、经验描述与理论提炼的脱节(重经验轻理论陷入朴素描述或重理论轻经验陷入教条套用)^[31]。

2.2 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义与判断标准

案例研究作为适配社会科学知识特征的重要研究方法,其过程可被视为通过深入挖掘特定情境中一个或多个案例的复杂性(背后具有一般性,即某个特定案例的复杂性可能存在于其他案例),并基于这种复杂性提炼出普遍性知识^[21]。这决定了社会科学中案例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发现两类知识——“独特性知识”和“一般性知识”^[11]:前者聚焦特定案例的情境化逻辑,通过对案例内部要素和动态过程的深描,揭示其运行机制与典型特征^[32],这种知识一般是能聚焦并回应特定情境下经验现象或特定案例运行机制的“理论性表述”,而非朴素的“经验描述”或“讲点故事”^[33];后者作为前者的高阶要求,力图以特定案例为载体,提炼出可解释和指导同类现象且能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理论性知识^[31]。因这类知识与理论具有较强关联,也被称为“理论解释(说明)”或“理论”^[34]。这两类知识不可分割且相辅相成。“独特性知识”是“一般性知识”的基础,缺乏情境化深描的“一般性知识”会沦为空洞的理论框架;“一般性知识”是“独特性知识”的升华,这是社会科学案例研究追求的核心知识形态,没有理论提炼的“独特性知识”无法实现跨情境迁移,仅能停留在经验层面。

案例研究与量化研究、理论思辨研究,以及同属质性研究范畴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扎根理论等常见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相比,其核心优

势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实现理论洞察与实践观察的深度交织与双向融合,消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35],进而在挖掘“独特性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并推演出“一般性知识”。这源于案例研究以“小样本、深描式”为核心特征,区别于依托截面数据验证理论假设的量化研究、偏重逻辑推演与概念辨析的理论思辨研究,更强调对研究过程与情境的完整呈现^[36],其重要价值在于能凸显案例现象的具体情境、追踪其动态演变过程并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关系^[37]。这一特征有助于弥补量化研究对实践复杂性与动态性关照不足的缺陷,也能规避理论思辨研究脱离现实经验、陷入抽象化推演的问题,回应理论抽象化与实践情境性的错位。同时,案例研究既可通过严谨的案例筛选开展比较研究以实现因果推断,还能通过对案例细节的深描来展现因果的作用机制^[38],充分捕捉特定案例的独特性与具体性,形成扎根本土实践的“独特性知识”。虽然与案例研究同属质性研究范畴的民族志研究借助深描能完整呈现特定文化场域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39],在挖掘“独特性知识”上也具有一定优势,但易陷入“深描有余、升华不足”的局限,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经验呈现层面,难以进一步推演出“一般性知识”。案例研究恰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可以本土的典型案列为载体与西方理论展开实质性对话,提炼或推演出可解释同类现象、具备跨情境迁移价值的“一般性知识”^[4,11],化解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悖离。诚然,与案例研究同属质性研究范畴的程序化扎根理论(我国体育学研究普遍采用此流派)强调从原始经验资料中“自下而上”地逐步归纳并实现理论建构^[40-41],具备生成“一般性知识”的潜力,但其依赖标准化的编码流程,易因过度聚焦程序规范而弱化对案例情境性和动态过程的深度挖掘,难以系统产出高质量的“独特性知识”。

综合而言,案例研究既能吸纳民族志研究的深描优势,深度挖掘“独特性知识”,又能以此为基础与既有理论展开深度对话,进而提炼或推演出“一般性知识”,最终实现“独特性知识挖掘”与“一般性知识推演”的统一,有效化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经验描述与理论提炼脱节的内在张力。这既是案例研究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核心

要义,也是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以知识生产为导向开展案例研究,是充分发挥其方法优势的逻辑前提。那么,如何判断一项案例研究是否真正完成了“独特性知识挖掘”与“一般性知识推演”,有效实现了知识生产?

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案例研究的特性,判断一项案例研究是否有效实现了知识生产,可从“经验挖掘深度”与“理论贡献度”两个维度展开,且两者需形成有机统一——经验挖掘是基础,理论贡献是核心,缺乏任一维度均无法构成完整的知识生产。“经验挖掘深度”主要关乎产出“独特性知识”,其核心在于案例研究通过“讲好故事”揭示出案例的深层逻辑,判断标准具体包括:一是情境化深描的完整性,能否全面呈现出案例的背景、参与主体、动态过程与关键事件;二是深层机制的穿透力,能否穿透案例的经验表象,挖掘出表象背后的复杂关联与深层成因^[42];三是案例选取的典型性与经验素材的真实性,案例是否具有类型学意义(如代表某类问题或实践模式),是否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访谈等资料。若案例研究能满足上述判断标准,则可认为其形成了“独特性知识”,完成了知识生产的基础环节。

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目标是在“独特性知识”的基础上发现“一般性知识”,即将案例中生动的“故事”转化为理论元素,以鲜明体现出“理论贡献度”,判断标准包括:一是与既有理论的对话性,是否明确回应了既有理论并与其产生关联;二是理论增量的明确性,是否产生了区别于既有研究的“新知识”,如提出新的概念、理论命题或分析框架,拓展既有理论的解释范畴或修正既有理论的前提假设;三是跨情境的解释力,所提炼的一般性知识能否解释同类问题或现象^[43]。

综上所述,高标准的案例研究,包含着对“一般性知识”的追求。案例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以特定案例为基础形成的“独特性知识”对“一般性知识”的证伪、补充或推进^[11]。案例研究的知识生产应同时满足“经验挖掘深度”与“理论贡献度”,理想的状态是以“独特性知识”为基础,以“一般性知识”为目标,实现经验与理论之间的迭代互动与双向赋能。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换言之,案例研究如何实现有效的知识生产?这需要研究者将“理论负

载”(指对案例现象的观察受理论指导的程度)保持在適切水平,处理好特定案例现象与现有理论的关系^[44]。“理论负载”的程度由低到高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不借助任何理论推导和理论视角;二是在一定理论视角(主要源于既往文献和前人的经验提炼)的指导下对案例进行分析;三是完全依赖于文献中的理论,以此在现实世界中“按图索骥”来裁剪经验现实^[38]。这为后续分析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误区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3 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主要误区

与社会学、管理学等成熟学科的案例研究相比,我国体育学案例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因部分体育学者对“特定案例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关系”把握失衡,导致知识生产出现了不少误区。依据理论负载程度由低至高,这些误区依次表现为“现象描述”“循环论证”和“理论套用”。这三者均有悖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经验扎根性、理论对话性和学术贡献性”等特征,只是在相悖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以下基于具体的体育学案例,结合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义与判断标准,拆解各个误区的主要特征,并深入分析其所导致的局限性。

3.1 现象描述

“现象描述”是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的普遍误区,其核心问题在于理论负载程度极低,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视角或分析框架,仅停留在对案例现象的经验事实描述,既未能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也未能与既有理论展开实质性对话,陷入“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窠臼。这类研究看似呈现了完整的案例故事,但未能有效实现案例研究中的知识生产,即从案例经验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独特性知识,对由此形成的一般性知识更是缺乏关注。如在“新乡贤驱动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中,作者发现新乡贤能作为“引领者”“育才师”“传播者”“中间人”,具有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传承乡村精神文明与加强乡村基层队伍建设等多重价值,并提出体育人才培养、乡村体育产业发展与落实文化体育交融等实践路径。就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要求和判断标准而言,其虽初步实现了案例的情境化深描,但并未体现出理论对话意识和理论增量,在剖析案例现象时未能充分调用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与社会资本等领域的

相关理论,提出的实践路径仅是基于案例经验的简单归纳,未能充分阐明其理论依据^[45]。再如有研究在“双减”背景下,以清华附小为案例,发现学校体育存在学生体质不断下降、课后体育服务质量欠佳、“家校社”共育机制不畅、课外体育家庭作业设计不够合理等现实挑战,提出“一体两翼三互动”的实践路径——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主导作用、家庭体育的基础作用、社区体育的辅助作用,通过三重作用的共同助力,即以学校体育为核心,家庭体育与社会体育为两翼,通过三方的协同互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46]。严格而言,该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其知识生产的误区表现为实践路径缺乏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也未能产生跨情境的解释力。具体而言,“一体两翼三互动”的实践路径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无法充分解释“学校体育主导、家庭体育基础、社区体育辅助”的协同逻辑。另外,仅以清华附小为单一案例,未考虑不同类型学校的差异性,路径的普适性无法得到保障,也无法形成具有外推价值的一般性知识。

诚然,这些研究基于特定的政策背景在实践层面展开了有益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案例研究仅停留在“现象描述”,与高质量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求之间存在张力,违背了“经验挖掘深度”和“理论贡献度”的要求。既未能深入呈现案例的复杂情境细节和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导致独特性知识的生产流于表面;也未能有效形成学术对话,更未能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命题,导致理论贡献十分模糊。这类研究既不能推动既有理论的发展,也难以作为新理论的建构提供支撑,无法为体育学的理论体系积累有效知识。在实践指导方面也较为乏力,因为缺乏坚实理论支撑的实践路径缺乏跨情境的解释力,难以为回应同类问题提供有效参考。进一步而言,因缺乏学术对话、知识增量和跨情境的解释力,削弱了研究成果的潜在影响力和持续生命力。

3.2 循环论证

随着体育学案例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意识到“现象描述”的弊端,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开始尝试结合特定的理论并形成分析框架,但又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这种误区的核心问题在于理论负载程度的失衡,主要指研究者在展开研究时,基于某一

案例“抽象”出一套理论框架并将其置于文章开头,再用该案例来支持或验证这个框架^[38]。这种误区本质上是“理论框架内生于研究案例,陷入自证闭环的逻辑谬误”。研究者虽意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并由此形成了分析框架,但框架的形成与验证均依赖于同一案例,形成“案例特征→理论框架→案例验证”的逻辑链条。这种研究看似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经验证据的支撑,但实质上是同义反复的理论建构,不仅无法阐明其所研究案例的内部因果机制(当基于某一案例抽象理论框架时,大概率会舍弃那些无法被理论化的案例细节,若这些细节恰好是探究案例内部因果机制的关键,那么这种做法反而会阻碍对该案例的深入理解),而且基于特定案例形成的分析框架缺乏外部检验与理论对话,无法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性知识,难以做出理论贡献(因为其只是为某些理论增加了案例注脚)^[38]。

如在“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研究中,研究者以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改造为案例,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提炼出“‘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理论框架”,后续再用同一案例的经验材料验证这一框架的合理性,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47]。这主要表现在理论框架生成的单一性和框架验证的闭环性:前者指理论框架完全基于闸弄口街道的案例数据,框架的核心维度仅能反映该街道的局部特征;后者指验证框架未能引入外部案例,也未能与特定的理论展开有效对话,仅通过同一案例证明框架的合理性,无法阐明这一框架的普适性。相似地,一项关于“体育促进城乡资源双向互动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思考”的研究也显现出“循环论证”的特点。该研究基于城乡区域要素流动理论和资源整合理论,结合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形成体育促进城乡资源双向互动的“资源识别—资源导入—资源统筹”理论框架,后续再用同一案例的经验材料对这一框架进行细化^[48]。这种循环论证仅提及框架的理论来源,既未能深入分析框架与既有理论的差异,也未论及框架对既有理论的推进之处,导致这一框架缺乏学术增量。不可否认,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将抽象的理论框架细化亦能产生一定学术价值。但这种框架的因果链条较复杂,包含的变量众多,难以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其有效性与普适性,仍属于“循环论证”,

易被其他案例所证伪^[38]。这种“循环论证”的误区还表现为忽视理论框架的本土适配性和案例的独特性,未能充分结合体育的相关经验现象推进对理论框架的认识。

诚然,与“现象描述”的体育学案例研究相比,以上举证的“循环论证”式研究的理论负载程度更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循环论证”与高质量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要求存在张力,在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更隐蔽。一是这种研究在分析案例时基本遵循变量的分析思路,为适配理论框架而裁剪案例经验,难以体现出案例本身的情境性和复杂性,导致案例的扁平化呈现,消解了案例研究“深描情境”的核心优势^[38]。二是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目标是形成可迁移的一般性知识,但上述研究形成的理论框架仅适用于单一案例,无法通过跨案例检验证明其普适性。这类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因缺乏外部效度,难以被后续研究引用或拓展,阻碍了学术知识的纵向积累和横向延展,导致很多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这不仅无益于体育学者更好地理解案例,也会加深体育学知识体系的碎片化程度。更严重的是,这种循环论证倾向在体育学的案例研究中已成为一种潜在的范式惯性,易被初学者误认为是“理论建构”和“增强理论贡献”的有效路径,导致学科内部出现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3.3 理论套用

在体育学的案例研究中,“理论套用”是理论负载程度最高的误区,其核心问题在于理论与案例经验的本末倒置,主要指研究者将成熟学科或既有文献中的现成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不考虑案例的独特性、理论与案例之间的適切性,直接用现成理论切割案例经验,造成理论与经验的脱节^[49]。相较于“循环论证”的“理论内生于案例”,“理论套用”本质上是“外源理论的前置性应用”,会形成“既有理论→裁剪案例→验证理论”的逻辑链条,使案例沦为既有理论的“现实注脚”。研究者往往会预设既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有效性,将其作为准绳来裁剪本土体育案例经验。一般体现为借用其他学科或文化情境下的理论来分析体育案例,或用体育案例的经验现象去印证其他学科或文化情境下的某一理论。这种方式看似具有理论创新,实则是“削足适履”——特

定案例沦为既有理论的验证工具,既无法充分挖掘案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难以推动理论创新。

如在“乡村体育振兴的新内生发展逻辑与实践探索”的研究中,作者以台盘“村BA”为案例,套用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其运行逻辑,验证了该理论在乡村体育振兴中的适用性^[50]。其理论套用的具体表现为预设了理论的普适性和绝对性,研究者未能深入阐述新内生发展理论的适用边界,直接预设其适用于我国乡村体育振兴,忽视了理论与案例之间的错位,更未能基于案例经验推进对既有理论的认识。这种方法看似实现了理论与案例经验的结合,但其本质仍是用既有理论框架“裁剪”体育案例经验。同样,在论及“中华体育精神的空间传承与创新”这一议题时,作者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案例,套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展开分析,忽视了理论的跨文化适配性和案例独特性^[51]。首先,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间矛盾,而我国北京冬奥会空间生产的制度背景与之存在明显差异,但研究者对此缺乏必要探讨。其次,套用空间生产理论的三个维度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进行分析,未能充分挖掘其空间生产的本土独特性,使本土案例成为西方理论的填充材料。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仅停留在“理论套用”而非“理论创新”。

显然,这种“理论套用”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较高的理论负载程度,无疑能拓宽特定理论的适用范围,甚至得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观点。不过,其本质上是一种“以理论为中心”的路径依赖,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预设了理论的普适性和有效性,易陷入用“理论剪裁经验”的困境,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高质量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经验扎根性”,也与质性研究需推进而非套用理论,通过理论创新提供“知识增量”的要求相违背^[35]。就“理论套用”导致的局限性而言,其多借用的是西方文化情境下形成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本土体育现象,忽视了案例经验本身的生成逻辑与文化语境,易造成文化逻辑的错位与解释力的弱化,既不能准确且全面地解读案例,也难以对相关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另外,这种将西方理论作为准绳的知识生产方式,会导致我国体育实践的理论潜力被忽视,使我国体育学案

例研究沦为西方理论的附庸,难以提炼出植根于本土体育案例经验的理论洞见。

4 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误区的消解

4.1 消解路径的理论依据

“理论修正”“理论拓展”“理论深化”3种消解路径的理论根基,源于社会科学中“理论—经验”双向互动的建构逻辑。理论并非静态的抽象框架,而是通过与具体经验现象的对话实现动态发展,这种对话可追溯至“证伪主义”与“限界条件”等理论。

“证伪主义”理论由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提出,不仅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认识论原则,还被作为社会科学应遵循的方法论准则。他认为“理论是通过猜测与反驳、尝试与排错而发展的假说演绎方法论,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检验理论”^[52]。检验理论会产生证实或证伪两种结果,与证实相比,证伪是更有效可靠的理论检验方法。若理论被观察到的现象所证伪,就要修正理论或发展新理论,这个过程就是理论完善和创新的过程。以证伪为目的进行理论检验,有助于使研究者寻找反例并进一步思考:是创新理论,还是完善理论,或是给理论划定更准确的适用范围^[53]。在此基础上,“限界条件”理论可应用于理论的证伪,该理论由美国学者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提出,作为解决社会学理论非科学性的关键,主要指“对理论成立条件的说明,这些条件划定了特定理论的适用范围与应用界限”^[54]。特定理论的限界条件越窄、越严格,则越难被证伪,可通过阐明特定理论的限界条件来明确其被证伪的可能程度。将“限界条件”与“证伪主义”相结合,能使社会科学的理论更加科学^[53]。这种结合为消解体育学案例研究中知识生产的误区提供了基础,证伪主义明确了“理论需通过经验检验才能发展”的基础逻辑,限界条件则强调了“理论与经验适配”的边界标准,两者共同衍生出“理论修正”“理论拓展”“理论深化”3种路径:理论修正对应“通过反常案例突破既有理论限界”的证伪逻辑,理论拓展和理论深化则契合“放宽理论的限界条件、延伸其适用范围并推进理论认识”等核心诉求。这3种方式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一个循环递进和螺旋上升的过程。

而案例研究的“深描式、情境化、过程化”方法

论特性,恰好与上述3种方式具有高度適切性。体育学案例研究通过对小样本的深描,能聚焦特定体育实践的微观过程,捕捉丰富的情境细节与动态机制,这既满足了理论修正对“以案例经验推动理论发展”的细节支撑需求,也能为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经验素材。另外,体育学案例研究覆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与体育传播等多元领域,其本土实践具有独特之处。这有助于避免理论先行导致的“削足适履”,又益于通过与既有理论的对话,凸显出上述3种路径的实践价值。无论是修正现有理论的解释缺陷,还是拓展既往理论在体育领域的边界,或是以体育独特案例深化现有理论内涵,案例研究凭借其方法论特性,能成为促进“理论—经验”双向互动的核心纽带,确保知识生产不仅能形成“独特性知识”,还能发现“一般性知识”。

4.2 消解路径的具体示例

4.2.1 理论修正

理论修正,即发现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反常案例,由此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革新^[35]。案例研究“小样本与深描式”的特征,恰好能为特定理论的修正提供情境细节与现实素材,避免理论修正沦为空洞的逻辑推演。通过特定案例修正现有理论,也符合高质量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与既有理论的对话”和“理论增量的明确性”等要求。具体可将体育案例经验为基点,揭示既有理论解释边界之外的现象逻辑;也可将现有理论的缺陷作为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体育学案例经验修正现有理论。

第一,聚焦现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反常案例。可从体育学案例中与现有理论预期相悖的经验事实出发,寻找既有理论的解释盲区。如在“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体育争议性事件”的研究中,作者以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无法充分解释“飞盘争议”为出发点,认为关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公众议程网络对媒体议程网络的影响。由此,聚焦于“飞盘争议”的公众议程网络,重点关注公众议程网络对媒体议程网络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飞盘争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特征与公众讨论焦点,发现其传播逻辑超越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单向模式,呈现出“公众议程→媒介议程”的反向网络议程设置效应,实现了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本土化修正^[10]。

第二,以阐述现有理论的缺陷为出发点,通过体育学案例研究弥补缺陷。对此,一项关于巩义市空竹协会活动参与者趣缘实践的体育学案例研究提供了范例。作者在提出经验问题后阐释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化理论的缺陷,包括忽视了身体感知觉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变化、身体感知觉的焦虑感与身体感知觉的关系、区域行动之间的切换和变化机制等。针对这些缺陷,作者通过对巩义市空竹协会参与者的趣缘体育活动实践进行田野考察,揭示了身体感知觉在结构化过程中的动态调节机制,认为“行动实践过程中‘边际效用递减的身体感知觉’可在更广泛的人类行为领域运用”,推动了结构化理论中“人性论”部分的创新^[55]。

由此可见,聚焦现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反常案例和将现有理论缺陷作为案例研究的出发点,能实现理论修正。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不仅有助于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并提升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还有益于深化对现有理论的认识进而增强其生命力。

4.2.2 理论拓展

理论的进步体现为其限界条件的拓展,当理论在新的情境中仍能有效解释经验事实,则可将该情境纳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实现理论拓展^[54]。理论拓展的关键在于保留既有理论的核心逻辑,调整其限界条件,具体可通过为既有理论增添新的解释维度、将原有理论基于新的案例或实践领域进行适用性延伸等路径实现。

第一,为既有理论增添新的解释维度。以一项关于“女健身私教与顾客情感互动中的工作体验”的研究为例。该研究首先指出“既往关于情感劳动的研究不仅鲜少涉及需结合情感互动的技术型劳动者,还欠缺劳客双方的并置分析视角和互动情境的问题意识,更忽视了顾客作为独立互动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劳客之间动态博弈对情感劳动过程的影响”。对此,以女健身私教为典型的技术型劳动者,通过搭建“女私教情感劳动—顾客情感回应”的双向分析框架,明确了顾客在情感互动中的主导性权力地位,形成“顾客主导—女私教调适”的动态权力维度。这不仅将情感劳动的常规分析视野从“劳资关系”拓展为“资方—劳动者—顾客”三方关系,还保持情感劳动理论“情感表达、互动关系、工作体

验”的核心逻辑,为该理论增添了技术维度的分析视角和“劳客互动的动态权力维度”^[56]。

第二,将既往理论基于新的案例现象或文化情境进行适用性延伸。诚如“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误区”的研究指出“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时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30]。以此为观照,在体育学的案例研究中,已有部分研究采用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如在“体育赛事‘多维可供性’构建”的研究中,先指出既往关于体育赛事的研究难以充分回应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下文简称“苏超”)这一案例所展现的复杂现实。面对“苏超”成为一个多层次、多通道的社会参与结构,其叠加空间动员、数字传播与城市文化再生产等诸多现象,传统的社会动员理论、功能主义赛事研究范式,因其对“环境”与“行为”之间交互机制的忽视,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解释缺陷。对此,以“苏超”为案例,基于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s)理论”,发现“苏超”这一地方性体育赛事突破了传统“精英竞技茧房”的封闭逻辑,转向一种具备制度开放性、主体可感知性与多样实践协同性的“多维可供性”构建路径,拓展了可供性研究与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边界^[57]。在一项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以西方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为理论基础,借鉴(而非套用)这一理论中的“行动者—转译—网络”3个核心概念,承接体育非遗保护领域“多元主体协同、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互构”的既有理论共识,结合闽南L村宋江阵保护案例经验,突破既往体育非遗研究“文化持有者必须到场”的理论预设,提出体育非遗保护网络可在文化持有者缺位状态下稳态运行的新论断,提炼出“单缘—多缘、人类—非人类”的十字型行动者网络,在保留行动者网络理论核心逻辑的基础上,将其适用边界延伸至返乡精英引领、多元行动者协同、内外部力量联动的闽南宗族型体育非遗新情境。这不仅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适用范围,更为体育非遗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知识增量^[58]。

以上研究均通过“理论拓展”,基于我国文化情境和本土体育案例现象对既有理论进行了适用性延伸,既拓展了这些理论的解释边界,更推进了对这些

理论的认识。

4.2.3 理论深化

理论深化主要指通过案例研究,对既有理论核心概念的再阐释或对理论内部结构关系的深入挖掘,实现对理论内涵的精细化解读,充分揭示事物运行的深层机制^[35]。

理论深化一般会基于既往理论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关于“传统武术组织关系演变”的研究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作者尝试以1978—2022年闽南桃源县的实践为例,深化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理论。具体而言,作者注意到既往关于差序格局理论的研究侧重于对横向亲疏关系的“差”展开探讨,对纵向上下关系的“序”缺乏足够关注,导致已有研究无法有效解释武术协会的纵向管理对传统武术组织关系的影响。此外,鲜有研究关注到关系格局的形态和内涵会随着时空场域转变而发生动态变化。针对这些缺陷,该研究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武术组织互动中的经验事实及内在逻辑进行考察发现,传统武术组织关系演变背后的深层逻辑暗含了社会关系由“伦理性差序格局”到“市场性差序格局”再到“权力性差序格局”的选择性重构与演进,由此提出“立体化的差序格局模型”,实现了对传统差序格局理论的横纵向拓展^[59]。此外,理论深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也在关于“体育非遗传承中文化凝固的生成机制”的研究中得到体现,作者聚焦既有基层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伦理)与结构关系(权力—伦理互动模式),通过案例深描实现对理论内涵的精细化拓展与深层机制的挖掘。具体来说,既有基层治理理论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对“权力—伦理”的阐释较为静态且缺乏实践观照,二是对“权力—伦理”的内部结构关系缺乏深度挖掘,导致无法充分解释体育非遗治理涌现出的文化凝固与渐次复兴的动态表现形式。对此,该研究通过对洪湖风舟基层治理的深描,不仅基于“权力—伦理”提出“体育非遗钟摆式治理”的概念,还揭示了洪湖风舟基层治理历时变迁的深层机制,即伴随时间情境下权力与伦理的主体能动以及互动转化所形塑出具有差异的外在表现^[60]。由此,研究通过案例实现了对既有基层治理理论的深化:不仅精细化解读了“权力”“伦理”的动态内涵与互动结构,更揭示了体育非遗治理中的深层机制,实现了理论深化。

上述案例表明,理论深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助于揭示在既有理论中未被充分涵盖的案例现象,不仅能丰富理论内涵,而且有利于促进理论的发展并增强其生命力。特别是在体育学研究领域,这种理论深化能更精准全面地捕捉到复杂多变的体育案例现象,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潜在裂隙,发掘出更多具有知识增量的理论观点。

5 结语

在体育学领域,案例研究兼有流行之势与实用之需。若体育学的案例研究能很好地进行知识生产,不仅有助于为解决体育领域的现实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还能推动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发展。但现有相关研究在知识生产时还存在一些误区,尤其表现为现象描述、循环论证和理论套用。若想充分消解这些误区,关键在于把握好理论与案例之间的关系,将研究的理论负载保持在合理区间。

进而言之,体育学质性案例研究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技术调适,更是回应学科使命和对接国家战略的核心实践。体育学案例研究知识生产误区的背后,潜藏着新兴学科在“追循范式”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张力,通过“理论修正”“理论拓展”“理论深化”等路径,或能为体育学科的发展探索出一条突围之路,使体育学从“新兴学科”逐步发展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学科”。放眼未来,以体育学案例研究为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既要扎根中国本土体育案例并从中探究出既有理论的解释缺口,也要善于从本土体育案例中提炼出兼具创新性和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唯有如此,案例研究才能真正成为体育学知识创新的有力引擎,进而成为体育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

参考文献:

- [1] 专家组.体育学质性量化研究:差异、误区与应对[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4):1-12.
- [2]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y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3] 柳鸣毅,敬艳,孔年欣,等.体育案例研究的学理基础、基本要素与中国探索[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36(1):12-

- 21.
- [4] 杨海晨,林志义.体育学质性研究中个案的代表性困境及消解[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5): 51-62,75.
- [5] 曾珍,吕万刚,孙毅.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马拉松赛事风险敏捷治理的构建路径——基于杭州马拉松赛事的个案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5,39(1): 13-22.
- [6] 柳鸣毅,王瑞,孔年欣,等.何以补齐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源短板?——基于深化体教融合典型实践的多案例分析[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2): 55-69,100.
- [7] 徐百超,王璇,沈克印.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基于海南省的个案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5,39(2): 60-73.
- [8] 王宁,蒋依依,王永顺,等.跨媒介符号互动中体育明星榜样效应的生成与审思[J/OL].体育学研究,1-20[2026-03-30].https://doi.org/10.15877/j.cnki.nsic.20251120.001.
- [9] 康益豪,王相飞,杨海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争议判罚的舆论演化及引导研究——以“肖若腾事件”为例[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44(2): 58-68.
- [10] 杨海晨,康益豪.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体育争议性事件研究——以“飞盘争议”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3): 73-87.
- [11]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中国社会科学,2018(8): 126-142,207.
- [12] 康益豪,林志义,杨海晨.超越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线上体育现象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实践与方法论反思[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5,51(5): 149-156.
- [13] 杨海晨,林志义.基于扎根理论比较思维的体育学质性研究想象力生成经验与反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2): 13-25.
- [14] 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 [15]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孙伟平,刘航宇.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从Sora的冲击波谈起[J].思想理论教育,2024(5): 12-18.
- [17]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0(6): 5-11.
- [18] 李阳杰.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现实前提与实践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6,28(2): 48-54.
- [19] 刘振天,肖瑜.教育研究:在“理念、理论、理解和理想”之间——兼谈教育学知识生产及其自主性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12): 67-76.
- [20] 刘显,张志勇.体育人文社会博士学位论文问题与反思——理论基础探微[J].体育科学,2012,32(8): 81-90.
- [21] 凌争.走出案例研究的迷思: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5): 125-133.
- [22] 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J].学术界,2012(8): 5-33,286.
- [23]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24] 郭台辉.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国自主性[J].中国社会科学,2025(12): 127-140,202.
- [25] CHARLES CAMIC.Veblen: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Who Unmade Economic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 [26] 傅翠晓,钱省三,陈劲杰,等.知识生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2): 155-160.
- [27] 卞冬磊.与知识脉络对话——学术论文理论价值提升的三条路径[J].新闻与写作,2024(7): 110-112.
- [28] 白长虹.面向实践的研究:调查、案例与“管理地图”[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1): 2-3.
- [29] 齐善鸿.面向实践的管理核心命题的重新思考[J].管理学报,2012,9(1): 32-37.
- [30] 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社会学研究,2018,33(2): 1-13,242.
- [31] 王宁.走出质性研究的三个误区——论青年研究的规范化[J].青年探索,2022(3): 49-60.
- [32] GOBO G.Sampling, 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4.
- [33] 张立平,陈向明.质性研究的迷思与澄清[J].中国远程教育,2024,44(2): 62-78.
- [34] 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J].思想战线,2019,45(5): 53-63.
- [35] 李大宇,黄欣卓.新型案例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3): 162-166,176.
- [36] 伍威·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M].孙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 [37] 黄江明,李亮,王伟.案例研究:从好的故事到好的理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0)综述[J].管理世界,2011(2): 118-126.
- [38] 蒙克,李朔严.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一个误区和两种传承[J].中国行政管理,2019(9): 89-94.
- [39]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40] 林志义,杨海晨.扎根理论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与问题反思[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2): 182-190.
- [41] STRAUSS A.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 [42] DYER W G, WILKINS A L.Better stories, not better constructs, to generate better theory: A rejoinder to Eisenhardt[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3): 613-619.
- [43] 毛基业,李高勇.案例研究的“术”与“道”的反思——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3)综述[J].管理世界,2014(2): 111-117.
- [44] 井润田,马珮.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基于历史启示和多维视角的平衡观点[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5,47(8): 53-67.
- [45] 陈治,赵晨杰.新乡贤驱动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基于3个案例的田野考察[J].体育文化导刊,2024(7): 9-15,

- 31.
- [46] 任海江,张守伟.“双减”背景下学校体育的现实挑战、实践路径与案例解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1): 116-124.
- [47] 陈文佳,刘博,王统领,等.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研究——基于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改造案例[J].体育学研究,2024,38(6): 100-117.
- [48] 王函明,徐开娟.体育促进城乡资源双向互动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思考——基于浙江省金华市“体育+”特色村(居)的案例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23,59(5): 93-103.
- [49] 管兵.案例研究的理论化:三种可行途径[J].广东社会科学,2023(3): 198-210,292.
- [50] 郭庆.乡村体育振兴的新内生发展逻辑与实践探索——来自台盘“村BA”的案例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6): 12-18.
- [51] 吴戈,李玄,张欣.中华体育精神的空间传承与创新——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看北京2022年冬奥会[J].中国体育科技,2024,60(1): 69-74.
- [52]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 [53] 尹海洁,庞文.证伪: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与必然兼与张杨商榷[J].社会,2009,29(4): 130-147,227.
- [54] 哈威廉.关于社会学定律的“限界条件”[J].社会学研究,1997(3): 50-53.
- [55] 张克峰,王凯珍,汪流,等.趣缘体育行动环节继替现象的客观阐释——对巩义市空竹协会活动参与者趣缘实践的案例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9): 64-74.
- [56] 康益豪,吕万刚,杨海晨,等.女健身私教与顾客情感互动中的工作体验——基于情感劳动理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6,60(2): 18-25,34.
- [57] 王凯,李冉冉.从“精英竞技茧房”到“社会开源接口”:体育赛事的“多维可供性”构建研究——基于“苏超”的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5,39(6): 37-48,104.
- [58] 梁艺炜,张越,杨海晨.联结何以强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者网络构建——基于闽南L村宋江阵保护的民族志[J].体育与科学,2024,45(3): 60-68,87.
- [59] 凌雅燕,白晋湘.重构差序格局:传统武术组织关系演变的民族志——以1978—2022年闽南桃源县的实践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7): 31-41,52.
- [60] 曹胡丹,杨海晨,陈连朋.钟摆式治理:体育非遗传承中文化凝固的生成机制及其反思——基于洪湖凤舟的田野观察[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4,41(6): 761-772.

作者贡献声明:

康益豪:提出论文选题,撰写论文;吕万刚:指导论文思路,修改论文;王相飞:指导论文思路,修改论文。

Misconceptions and Resolu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Sports Science Case Studies

KANG Yihao¹, LYU Wangang², WANG Xiangfei¹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President Office,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method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sciences, case stud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in sports studies. Meanwhile, it has given rise to certain misconception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Ranked from low to high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theory-ladenness, these misconceptions are manifested as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circular reasoning, and mechanical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To resolve these misconcep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es and theories. Specifically,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ladenness in case studies can be maintaine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through approaches such as theoretical revision, theoretical expansion, and theoretical deepening. This study fills the gap regarding the lack of discussion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misconceptions in sports science case studies, and can provide guidance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ase study research in sports science.

Key words: sports science; case study;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ladenness; theoretical revision